

城市化进程中的文人使命

——冯骥才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高兴

摘要 :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冯骥才是著名的城市文化保护者,他的城市文化意识在时间向度上表现出开放与建构的品格,同时强调城市文化的历史性和空间性相统一,尤为重视城市文化的时间意义和空间价值。冯骥才对于天津这座城市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天津历史文化在他看来是东西方文化交融和碰撞而构成的一种“奇异的创造”。冯骥才痛惜天津旧城遭遇“建设”性破坏,他将信念化为行动,通过文化“抢救”和文学创作来记录和描述天津的历史文化,彰显了当代中国文人的智慧、良心和使命。

关键词 :冯骥才 城市 历史文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730(2012)06-0130-06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如何保障城市及其文化的健康发展已成为一大难题。芒福德警告世人:“生产和城市扩张的自动化进程日益加快,它代替了人类应有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目标”,人类“在物质能量、工业生产率,在发明、知识、人口等方面”出现“愚蠢的扩张和爆炸”,结果“距离合乎人性原则的理想目标也越来越远了”^[1]。城市化进程给人类文化成果造成了巨大冲击,阮仪三指出:“由于‘建设’而造成的对文物古迹的破坏是惊人的”,“在经过了许多的教训和挫折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了历史建筑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2]。西方学者 Sharon Zukin 提出城市文化是组织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城市的历史形象“不仅反映了真正的城市空间”,也能“从特定的视角对一座城市的纪念碑性质进行想象的重组”^[3];他认为对城市历史性建筑的保护甚至构成了城市经

济发展的“文化策略”^[4]。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为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建构城市文化形象而不懈努力,例如:陈平原之于北京文化、冯骥才之于天津文化、冯天瑜之于武汉文化、杨剑龙之于上海文化、杨宏烈之于广州文化、张鸿雁之于南京文化……诸多学者与城市的文化情结折射出当代中国人面临经济、文化全球化趋势,对于城市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高度关注。

冯骥才先生既是蜚声文坛的作家,也是著名的城市文化保护者,他在给阮仪三《护城纪实》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盛赞其文化良心和人格精神。本文以冯骥才与天津城市文化的关系为切入点,结合冯骥才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探讨城市化规模急剧膨胀的时代背景下,冯骥才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智慧、良心和使命。

一、时间意义和空间价值：冯骥才城市文化意识的核心

芒福德指出：“古往今来多少座城市又无一不是时间的产儿。城市是一座座巨大的铸模，多少人终生的经验积累都在其中冷却着、凝结着，又通过艺术手段被赋予永恒的形式……在城市环境中，时间变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已经是当今城市中一项重要事实。”^[5]城市文化具有时间内涵，它是人类世世代代艺术经验的结晶，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迹非常重要。

芒福德从人类学层面上对于城市文化作出了理性反思，而冯骥才的城市文化意识具有鲜明的人文情怀，他“关心的是民族的精神问题”，其文化立场“是超越城市本身的”^[6]。冯骥才既睿智地洞察了城市文化的时间意义，又清醒地认识到城市文化的空间价值。

冯骥才认为“时间也能创造财富。文物是时间创造的”^[7]，宣称“一件古物救活了一片消失已久的遥远的生活图画”^[8]，感叹“历史的过程一半是创造，一半是泯灭。它把世界缤纷地填满，随即再抹去，于是留下了一片空白，往往使我们迷失于一种记忆的真空中”^[9]。冯骥才不遗余力地从事古城的保护，是因为他看到了城市历史文化的易逝性和不可再生性，并为此感到忧心如焚：“城市的历史文化形态，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财富。凡历史创造的，都是一次性的，失去了便无复再生。尤其那些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地球上活着的最大的文物，是千姿百态的人文奇迹，是一个个充满魅力的精神空间。任何文明的民族都懂得，必须珍惜它，保护它，加强它和衍续它。”^[10]冯骥才并非以线性思维来审视其时间意义，他认为“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需站在未来才能看到。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这就需要培养一种敏锐的“文化眼光”，具备足够的“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11]。冯骥才对历史遗产的珍视是

建立在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事业服务的思想基础之上，绝不能被解读为简单的“复古”，他的体会是：“其实历史的价值是一种被认识的价值，而对历史的认识都是为了现实与未来。那么历史价值最终是一种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12]冯骥才的城市文化意识在时间向度上具有开放与建构的品格，他总爱用“发酵”一词形容城市文化的孕育和发展。

冯骥才曾提出城市文化的历史性和空间性相统一的观点：“历史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历史在化为时间流逝而去的同时，又化为一种神奇的有灵性的空间存在下来。”^[13]将历史视为空间存在，这不仅因为绘画天赋对冯骥才的感知方式造成了影响，更源自他的文化立场——主张文化的多元和平等。他多次声明“关心文化全球化”，“关心国民的文化精神”^[14]。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冯骥才认为“全球化在文化上是一种同化”，而“同化的结果便是趋同和泯灭个性”，所以提出“文化的地域特征一旦形成，它就成为一种个性的生命，互相不能替代。在日趋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这种各异和独自的文化个性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价值”^[15]。他告诫人们“警惕地球文化”，因为“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多元性”^[16]。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平等的，冯骥才不仅主张东西方文化可以互补，而且认为北京和天津等城市的文化地位不存在高低之分，“文物之间可以划分品级，文化之间却是完全平等的。各个民族、地域、城市的文化都是自己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都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17]。多元、平等的城市文化价值观使冯骥才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历史空间意识。

在冯骥才眼里，每个城市都是有生命形象的，他对城市文化的认识不完全趋同于芒福德那样冷静的西方学者，虽然他也强调城市历史遗迹保护的必要性。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城市古建筑和老街道，冯骥才不但思索着它们的文化内涵，更品味着它们的人文精神，于是时间和空间在他的心灵中开始盘结、交融。

二、“奇异的创造” 冯骥才眼中的天津城市文化

“上海学”早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北京学”也日益崛起于学林，而天津城市文化的研究相对滞后。“五千年中国看西安，一千年中国看北京，一百年中国看天津”，天津无论在近代工业发展还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曾经独领风骚，其辉煌的城市文化却尚未引起当今学者的足够重视，岂不有些怪哉？

在当代文坛，冯育楠、冯骥才、林希、肖克凡等作家的作品被视为“津味”小说，但“津味”文学的势力并未雄厚，研究者指出“‘津味文学’写作机制的核心，是上世纪 80 年代特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氛围与一种地域文化有机的文化认同”，况且“‘后津味文学’整体上凸显了一种地域文化与当下生活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它最终呈现出的，与其说是一种‘津味文学’的当下延伸，倒不如说是‘津味文学’的终结”^[18]。该观点至少表明“津味”文学在反映天津地域文化方面的欠缺和遗憾。冯骥才的身份较为特殊，他既是表现天津地域文化的优秀小说家之一，又是“抢救”天津历史文化的斗士，常以文化人的身份纵论天津城市文化。

冯骥才“出生在天津，却不是天津人”，“站在门槛上”评说天津则“距离正好”^[19]。冯骥才对于天津有着极深的情感，他坦言：“因为我知道天津这块土地繁华的由来，及其种种崎岖与艰辛。没有这块土地就没有我的生命。我生命的偶然在这里成为必然的。因而，我是怀着感恩戴德之情，去寻访先人们每一步的足痕。”^[20]冯骥才在对天津的观照和叙说中融入了深深的历史沧桑感，对天津昔日光景的追怀实际上也包含着他的生命体验与心灵寄托。

冯骥才认为明代永乐二年建成的天津老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城中十余万天津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此，渐渐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天津老城简直成为“天津人赖以自

信的潜在而坚实的精神支柱”^[21]。冯骥才还“多少受一点法国的文化史年鉴学派的影响”，认为“天津最具魅力是在清末民初，那是这个城市的转型期，随着租界的开辟，现代商人进入天津跟本土的文化相碰撞，三教九流都聚集在天津，人物的地域性格非常鲜明和凸显”^[22]。这一论断符合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农村文化较为封闭，乡土社会大多隔离，而“城市文化显然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特征”^[23]，五方杂处的文化生态促使现代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另外，“城市的重要特点或者本质特点是集聚”，它“不仅是各路文化人才的聚集地，而且也是各种思想流派、艺术流派的相互交锋、相互融合的场所”^[24]。冯骥才确信近代天津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在 20 世纪初，“天津是中国的一块大磁石，把天南地北的人往这块忽然走红的土地上吸”^[25]，形成无比繁荣的文化景观：“海港、铁路、电讯、建筑业等，和西方人带来的先进城市设施以及国际资本”，那时还发生了“天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移民带来大批资产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技术，“使得天津在二三十年代这短短的时间里就一跃成为我国近代领先的魅力无穷的大都市”^[26]。

冯骥才指出了天津的“三个历史文化空间”：“老城范围内的本土文化空间”、“以旧租界为中心的近代文化空间”和“沿河而存在的文化空间”（即“码头文化”空间）^[27]。他辨析了城市文化空间与天津人的性格心理的联系，认为“租界的天津”和“码头的天津”这两大文化板块对于天津人文精神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构成“说天津话的天津”和“不说天津话的天津”^[28]之别。他觉得码头文化更具有天津本土特征，“天津这城市，受益于海河水系。这无疑以码头为起点”^[29]，码头文化孕育出天津人的个性：他们有“一副火热的肠子”，“急公好义，守望相助，人情味十分浓厚”，他们秉持“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原则，“钦佩有真本事的能人”，他们“重市井有过于社会”，所以“天津的艺术很少有凌驾于市井之上的沙龙艺术或什么纯艺术”，他们“温

饱知足,知足长乐”,将“自嘲”作为“语言的笑料和生活的调料”^[30]。冯骥才断定天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时间较短,而且“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缺少契合”,“在近代天津城市的流变中,真正发生作用的还是本土的码头文化”,天津人形成了“炽烈爽朗、逞强好胜、充满活力的地域性格”,他们“运用外来商机,将天津发展为北方商埠的人文基础”^[31]。冯骥才也极为重视中西文化碰撞对于天津文化的影响,他意识到“如果把这个历史内容抽去或删除,天津剩下的恐怕更多的是平民化的市井生活了”^[32],肯定了租界“五大道”、小洋楼等城市景观的文化价值和历史魅力,宣称“一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入口’”,除了指向“老城文化”的“传统入口”之外,还有另一个“近代入口”可以透视外来建筑“小洋楼”,它构成“天津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33]。

冯骥才看到“近百年中国的大城市都是‘中西碰撞’给撞出来的”,强调 1930 年代的天津与上海的相似性,在天津能够找到与上海十里洋场类似的摩登场景,但老天津的灿烂光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褪色,连李欧梵这样深谙民国文化形态的学者尚不知情,遑论普通大众对于曹禺作品中的老天津的知晓?据冯骥才的理解,天津的近代文化只纳入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文化形态”而没有形成“思想文化形态”,“尽管天津受西方文化和科技影响方面一度在中国占领先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说天津对外来文化持欢迎态度”,外来文化形态“基本上存在于租界中”,何况“旧日的天津与京都近在咫尺,皇城根下任何响动都能传入大内”,造成了天津“地方文化的保守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天津是中外政治军事冲突的前沿”,“列强的霸悍凌辱与强烈的民族自尊酿成一种排外情绪,曾经深深积淀在本地的文化心理中。故而,上海与天津虽然都是最早接受外来事物的大城市,但上海的文化心理是崇洋,而天津只有在租界内与上海近似,本土大众对于‘洋’字从不顶礼膜拜,最多只是‘好奇而已’,甚至在‘好奇’、‘戏谑’之中夹杂着“一

种隐隐的对抗”^[34]。冯骥才对于天津历史文化的深度解析令人感叹。在他看来,天津城市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融和碰撞而构成的“一个奇异的创造”^[35]。

三、记录和描述:冯骥才对于天津文化的“抢救”与刻画

冯骥才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被破坏的现象感到揪心不已,他真切地感慨:“我们这个自诩为文化大国的国家,多么迫切地需要多一些虔诚又火热的文化良心!”^[36]

听闻天津旧城将遭拆迁,冯骥才立即四处奔走,组织专家对老城遗迹展开地毯式考察,拍摄了大量具有天津历史文化内涵的照片,出版了大型画集《旧城遗韵》向人们展示天津旧城的历史遗存和文化景观。此后,冯骥才又组织文化、历史、考古、建筑、民俗等多方面学者对天津的租界建筑及码头文化遗址进行考察、研究和拍摄,按照他对天津城市文化空间的理解,主编出版了《小洋楼风情》和《东西南北》这两本文化图册。冯骥才将捍卫天津历史文化的巨大激情融入到挽救津门老城、抵制租界建筑被破坏、抢救濒临毁灭的估衣街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从他倡议建立保护城市文物古迹的法规、现场签售明信片《估衣街珍存》等细节行为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天津历史文化的爱护。他的苦心经营“终究将历史消失前的一瞬,形象地锁定为永久”^[37]。

冯骥才将良知付诸实践,将信念化为行动,李欧梵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冯骥才承认:“有机,就是多方面结合的、追求效应的、行动性的。我喜欢行动——用行动来实现思想,或者把思想变成充满活力的行为。”^[38]他干脆用另一名称“行动知识分子”来表达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39]。冯骥才除了写作之外便致力于文化保护事业,出版了一些与文化保护有关的书籍,还亲自到国外考察其他国家关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措施及方法。他在《抢救老街》、《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

患》等著作中继续呼吁人们保护天津历史文化。近几年,他的文化视野和活动范围有了新的拓展,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加紧抢救少数民族濒危文化,但他始终强调实际行动的意义:“请学者们暂时离开自己的书桌,到田野去!研究的工作永无止境。抢救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性的使命。”^[40]

无论冯骥才拥有多少种文化身份,勿忘他是一位怀有人间情怀的优秀“作家”。他对天津的爱不仅反映在其护城行为里,也表现于文学创作中。

冯骥才认为“作家最重要的是抓住地域的精神,也就是地域人的精神”^[41],其作品体现了“对地方乡土有着浓厚的情爱”^[42]。冯骥才在散文《逛娘娘宫》中动情地回忆了儿时所见到的天津画卷,对于旧时年货市场上的炮、灯、画、糕充满着无限神往,领略到了老天津“一个无法形容的、灿烂辉煌、热闹非凡的世界”^[43],宫北大街、宫南大街、娘娘宫以及戏台、集市、小贩、香客、游人的天津人文景观在他的笔下呈现得那样清晰。冯骥才的很多小说“有意兑进”了天津的“历史风俗画的溶液”,“把风土人情、历史习俗、民间传说,全渗杂进去”^[44]。《神鞭》生动地再现了晚清天津的社会风俗面貌,勾勒了天津城的自然风光、野市商店、市井娱乐、规矩礼仪等生活形态,又渲染了天津人的性格、道德、信仰等精神内涵。《鹰拳》以天津租界的民园球场为历史舞台,刻画了一位胸怀正义、武技高超的天津老者形象,他施展神功当众惩治了蛮横无礼的外国士兵以后,便隐藏于集市当中售卖炸糕,凝聚着天津人的人格魅力。《神灯前传》和《神灯》抒写了老天津浓厚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荒芜的旧城、密布的村落、穿梭的航船、美味的小吃、云集的商贩、杂多的艺人……这些都被冯骥才描摹成“一幅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天津卫的晚清社会的风景画”^[45]。在冯骥才的笔下也有当代天津景观的描绘,例如他的小说《匈牙利脚踏车》展现了由租界“中街”演变而成的解放路上的交通拥挤现象。总的来看,冯骥

才在文学创作中关注更多的还是天津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他始终对天津的市井人物倍感兴趣,这基于他对天津历史文化的独特理解:“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耀上层,更在市井民间。”^[46]在天津的市井民间中潜藏着很多奇人异事,所谓“津门胜地,能人如林”^[47]。《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奇人管万斤》、《炮打双灯》、《好嘴杨巴》、《张大力》等作品无论意在文化批评还是文化撷英,均鲜明地凸显了天津的人文气息和历史韵味。

“天津虽为近代名城,由于历史曲折独特,民俗尤具鲜明个性。既有纯真质朴之乡土气质,又有殷勤热切之市井情怀;既有燕赵故地豪爽刚强之气质,又有商业重镇精明活泼之性灵”^[48]。冯骥才怀着对于天津城市文化的欣赏与热爱,挖掘和宣扬天后宫剪纸、杨柳青年画、连环画和小人书等民间文化形式的宝贵意义,成为他继古城抢救和文学书写之外的又一文化义举。综观冯骥才在记录和描述天津历史文化方面的执着行为,可以深切地体验到他对这个文化名城所怀有的良心与使命,他不断地践行着自己的文化倡议:“再多一点天津味”!^[49]

四、结语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固然给市民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与富足,无数先人以智慧与汗水营构起来的文化遗产却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当代人应当进行深刻反思并做出正确选择。

自古以来,文人与城市渊源颇深,市井、酒馆、沙龙、公园、大学、咖啡店、影戏院等各类城市空间中都曾留下他们徘徊游荡或激情飞扬的身影。本雅明认为作为“游手好闲者”的文人是“大城市的产儿”,文人在漫步中“展开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关系”^[50]。本雅明是一位“收藏者”,他声称“收

藏者的态度是一种继承人的态度”将“收藏”看成“现代世界的生存者的抗争和慰藉”，由于“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收藏”有助于还原文人的内部世界，“在传统和充满先辈的气息和注目的事物中，他感到与那个精神的整体同在”^[51]。

冯骥才也曾表示“收藏观是一种价值观”，“收藏者的快乐”在于“发现”和“享受”，但他绝非一个只关注自我内部世界的文人，他强调“使古物收藏在保存文化和体现文化方面发挥作用”^[52]。也许中国的文人精英们更关心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性，1940 年前后的郑振铎先生曾奔波于抗战的烽火中，为“抢救”大批遭劫的民族文献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如今，又有冯骥才先生奋斗于城市化进程的激流里，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发扬民族人文精神而疾声呐喊、四方求索。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历史的拾遗”^[53]这种艰苦繁忙的文化工作，昭示着当代中国文人的智慧、良心和使命！

注释：

[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年，第 418 页。

[2]阮仪三：《护城纪实》，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年，第 2 页。

[3][4](美)朱克英(Zukin,S.)：《城市文化》，张廷佺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4、265 页。

[5](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6][14][15][22][39][40][41]冯骥才、周立民：《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63、11、82~83、203、138、133、209 页。

[7][8][11][42][44][52]冯骥才：《我是冯骥才 冯骥才自白》，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年，第 277、298、246、179、195、243 页。

[9][10][12][13][16][17][19][20][21][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48][53]冯骥才：《手下留情 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年，第 27、11、20、28、95、48、173、27、212、173、39、28、174、225、182~183、184、39、18、179~180、23、6、1、234、147、27 页。

[18]张大为：《经济理性时代地域文化的认同困惑——论“后津味文学”写作》，天津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

[23][24]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3、17~18 页。

[43][45]冯骥才：《冯骥才选集(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年，第 22、375 页。

[46][47]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 186、196 页。

[49]冯骥才：《我心中的文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年，第 250 页。

[50][51]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第 5、11~12 页。

作者简介：高兴，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博士、讲师，云南曲靖 655011。

(责任编辑 程平)